

再说大家气象——致阔海

□范曾

客有问何谓艺术之气象?何谓小家气象?何谓大家气象?大师与巨匠之气象又若何?

气象者,简言之即为气。人之吐纳,气也;心灵之吐纳,亦气也。艺术之气象,当指心灵,而非物质。唯人之圣凡雅俗,千差万别,其所吐纳,固自不同。凡刻红剪翠、雕虫小技,津津于一得之见,其所为作,仅聊供耳目之娱,其人之心灵徒增堵塞者,此小家气象耳。凡遣云使月、技精屠龙,恢恢乎万物罗胸,其所为作,岂徒感官之快可限?读者心旌必为动摇者,此大家气象也。至于大师,则军中之统帅、文章之司命也。艺进乎道,思尽波涛、悲满潭壑,故其气象大方无隅、不可端倪,每观其作内心之净化非言语可形容者。更上巨匠,则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者也,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所求理中之理,所索象外之象,其作品之感人宛若梵音法鼓、教堂钟声,心归于寂,意归于淡,似日月星辰之巡天,江河流泉之行地,无一处不圆融,无一处着痕迹,艺至于斯,可谓化境矣。最上魔鬼,五百年未必一见,人文肇始以至于今仍付阙如,兹不欲置喙矣。

客又问:则阔海之气象若何?十翼每观其人,慧而憨、智而直,凡所陈词,皆为心迹,略无遮拦,落落大丈夫也。复观其画,则吞吐大荒、心游万仞,非小名家之小吐纳也。凡此种种皆与上述对大家气象之剖析暗合,恣肆之笔来自胆识,浩瀚之情胸于胸怀,关西大汉抡铁板唱大江东去,固当为画坛之豪杰也。

十翼观夫阔海之素描,尽精微、致广大,骎骎与俄罗斯大师斐逊争雄,故知阔海之放笔纵横,自有扎实根基。所作速写,尤能将稍纵即逝之印象于聊聊简笔中透露,非才气



杨家将(中国画) 王阔海 作

过人者,未可臻此。阔海是大写意高手,追其缘由,盖知基厚而台高,识广而见深,非浅学者可梦见。

中国画六法之说,古所述之详矣,然终不得其要领者,以论之者皆非大手笔之实践家。以余之见,六法中仅须具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两条,其他四法皆在其中。象形、赋彩、位置,皆气韵生动所必须之条件,移模则画家末事。而无骨法用笔,象无以立,神将焉托?气韵何来?阔海之画,气韵生动,自不待言,而其用笔跌宕雄健、腕力过人,故其画每有震撼力在。观者于画前所以难以移步者,以其内蕴丰厚而笔墨迷人也。阔海既为行伍中人,故其游目骋怀往往重萃莽大者,军人之作风在风驰电掣、势不可当,而其胆识虽王羲之之笔阵图无以过。总之,在气韵与骨法两方面,我们对阔海都毫无值得怀疑处。

近年来阔海提倡“新汉画艺术”,在他的一篇滔滔说词中我曾谈到他分析新汉画艺术之五大特征。我是诗人,有诗人之性,以为他谈得未免沉重。我看以阔海的性格:气盛、强悍、憨直,对他的新汉画最简捷的解释是借汉代之杯碟,满斟个性化的美酒,以浇自己的块垒,斗酒十千恣欢谑,这才是真正的阔海。有李存葆兄激赏阔海的文章在前,我续貂是必然的了,不过对李文阔画,我都有求全之毁如下:

李文讲苟阔海在生意场和战场,前者必蚀本,后者则败绩,都是不确的猜想,阔海在什么领域都会纵横驰骋,譬如带一个排的冲锋队,他绝对是身先士卒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勇士,至于是否能运筹帷幄,那则悬疑。于是联想到阔海的画,阔海的确有庄子“时恣纵而不傲”的品格,但是那“弘大而辟,深闳而肆”的境界则应该是阔海的终极目标。那时的画则会如曹孟德之诗:“水何澹澹”,不会永远波涛三洞,这就是我希望于阔海的:纵横之气外,更增冲融之气;恣肆之外,更有内敛。我们期予阔海的不只是立马横刀的孤胆英雄,而是一位从容的将帅,到那时,我们则称他大师。

壬午仲夏于北京碧水山庄

曹晶,你准备好了吗

—《关山叠》—曹晶中短篇小说集读后

其作品,一睹西北军营生活的某些风貌、构造和特质,因而被专家们稍微看好。不管基于怎样的原因入选,对于曹晶来说,这其中似乎包含着双重的意味,即对其既是一种荣誉,我们有理由为他感到高兴;但更是一种压力和期望,作者的代表性似乎还不是那么毋庸置疑,“星”的光芒还谈不上有多么明亮,其在文学上要挑的担子会很重,要走的路还很长,要爬的坡更艰难。对这一点,相信曹晶本人和读者都会清醒意识到的。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曹晶以及那些在军旅生活领域继续耕耘的青年作家,怎样勇敢地担当起军事题材文学的发展之责。曾几何时,部队的作家备受社会关注,在整个中国作家的浩荡行列中,可以说是最优秀、最生机勃勃的一群。那是一支怎样锐意进取、实力强劲、成果丰硕的队伍啊!他们以在当时具有先锋意义的文学创作,引领了时代文学的风气和潮流,创造了一种可以载入史册的辉煌,从而受到广泛的瞩目与盛赞,至今仍有人为之津津乐道,许多知名作家和名作仍不断被人们提及。这些年部队作家的身影,则渐渐显得有些寥落,虽然仍有一些人身笔两健,发声也不同凡响,但在中国最优秀作家所形成的第一阵容中,已经有些看不到部队作家强大而整齐的队形了,给人以形容单薄、步调凌乱的落寞之感。虽然也有一些部队青年作家,显示出颇为扎实、新锐甚至另类的风格,但从总体气象上说,终究显得有些后劲不足,不那么壮观大气。在整个军事题材创作的美学探索上,看不出他们迈开了怎样的前进步伐,似乎无奈地处于某种停滞的、止步不前的状态,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令人刮目相看。照此下去,军事题材文学被边缘化也并非没有可能,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和焦急。

我们把曹晶放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来看,就具有了一种别样的意味。曹晶之所以入选“军事文学新星”,其长处在哪里呢?地处大西北而且工作在大军区机关的他,自然具有某种观察和表现生活的独特视角。他拥有的从军经历和可以到达的活动空间,使他既有从宏观上体察和审视生活的开阔眼界,在写作上显得不那么局促和拘泥。同时他又能以切近的目光去端详他所熟悉的生活,把他从生活中慧心所得的积累,变成一种文学的发现和感知。因此,当他将笔触对准有着无穷滋味的军营时,那些混合着时代声响、生活情致的人和事便纷至沓来,拨动着我们的心弦。曹晶写现代环境下的军人和他们的生活与情感,于是我们看到了军人们,特别是基层的官兵们的奋斗与追求、牺牲与奉献,对职责与使命无愧坚守的个性特征和形象光彩。当然我们也看到官兵在生活中遇到的欢乐与苦恼、顺利与失意、困境与尴尬,这些都反映了当下军人生活无可回避的真实,也表明了曹晶是怎样竭力做一名当下军营生活的观察者和有心人,并且努力地将捕捉到的时代光影和军营声响,将他的所感所悟和所思所想,用文学的方式真诚地书写下来。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可以读到令人颇感兴趣的西北军营人物、生活风情和时代印迹。曹晶是敏感的,也是质朴的;是聪慧的,也是真诚的,具备了

伐,似乎无奈地处于某种停滞的、止步不前的状态,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令人刮目相看。照此下去,军事题材文学被边缘化也并非没有可能,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和焦急。

我们把曹晶放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来看,就具有了一种别样的意味。曹晶之所以入选“军事文学新星”,其长处在哪里呢?地处大西北而且工作在大军区机关的他,自然具有某种观察和表现生活的独特视角。他拥有的从军经历和可以到达的活动空间,使他既有从宏观上体察和审视生活的开阔眼界,在写作上显得不那么局促和拘泥。同时他又能以切近的目光去端详他所熟悉的生活,把他从生活中慧心所得的积累,变成一种文学的发现和感知。因此,当他将笔触对准有着无穷滋味的军营时,那些混合着时代声响、生活情致的人和事便纷至沓来,拨动着我们的心弦。曹晶写现代环境下的军人和他们的生活与情感,于是我们看到了军人们,特别是基层的官兵们的奋斗与追求、牺牲与奉献,对职责与使命无愧坚守的个性特征和形象光彩。当然我们也看到官兵在生活中遇到的欢乐与苦恼、顺利与失意、困境与尴尬,这些都反映了当下军人生活无可回避的真实,也表明了曹晶是怎样竭力做一名当下军营生活的观察者和有心人,并且努力地将捕捉到的时代光影和军营声响,将他的所感所悟和所思所想,用文学的方式真诚地书写下来。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可以读到令人颇感兴趣的西北军营人物、生活风情和时代印迹。曹晶是敏感的,也是质朴的;是聪慧的,也是真诚的,具备了

□汪守德

一位生活在那样一片土地上的作者所具有的冷峻和幽默的性格。让我们认识到他在进入这一写作时所抛洒的心血和汗水,也让我们体验和咀嚼到了一种西北才有的味道,这种味道似乎只有西北的作家才能够传达得出来。

但我还想指出的是,曹晶的不足也是明显的,一些作品对所要表现的军营生活,还谈不上有多么精到独特,意味也不那么浓郁厚重,文字也不够温润激扬,有的篇什有仓促和浅显之嫌,总体而言未曾达到能与同代青年作家相媲美的文学高度。就是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不足。怎样使自己成为一名文坛上数得着的重要作家,是需要曹晶卧薪尝胆来面对的。因此我们为曹晶也捏了一把汗。“军事文学新星”的入选者无疑是翘楚,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们或许会拿某种尺度来衡量你,作为一名入选者其实也是很不轻松的,会被要求成为那种挑大梁的角色,能够在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上达到新的深度,作出新的突出贡献。曹晶,你准备好了吗?但我们也并不希望因此赋予其过重的心理压力,我以为他仍然可以坚持自己风格和路数的创作,就这样一直心无旁骛地写下去。也许坦然轻松地面对这一切,才是最好的创作状态,才是达到最佳顶点的好路径。但我们希望曹晶能够秉承西北前辈军旅作家惯常的追求和探索的文学传统,在那样一块神奇的土地上,通过执著坚忍、才气贯注的勤奋创作,续写一种不同于前人、而专属于自己的文学新辉煌。

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作为一种艺术创造资源的革命历史

—评程步涛诗集《记住那些地方》

□殷实

在向来被指为“穷山恶水”的地方行走。诗人通过对自己在一次次行走中所摄取人、事、景、物的咏叹——有时是近乎悲凉的咏叹——而得以表现出来的,是对历史苦难的重新咀嚼,是对构成我们民族当下生活价值内涵和意义系统中“信仰”要素的提取。读者会发现,整本诗集并非随意编成,作者实际上是有意识地探索了中国的一些特殊地方之后集中写出了这本诗集中的大部分诗篇。那都是什么地方呢?最多的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旧地”,或称“革命圣地”,当然也毋庸讳言,这些地方今天在新闻报道中大都位列所谓的“老、少、边、穷”地区。

走近这些地方/灵魂就会震颤/骨骼爆响/热血贲张/圣洁的感觉会涌遍全身/走近这些地方/会感到生命的深刻和饱满/眼前闪过的/都是秋风散关/残阳热血/疆场赴死/是生命的一种高度

众所周知,近年有“红色经典”、“红色旅游”之类的发明:直截了当的程式化说教与旅游“产品”营销意识的怪诞搭配,既缺乏想象力,也无从升华历史时空所寓含的崇高精神——或许本意无错,只不过方法过于粗糙简陋,结果就难免让人啼笑皆非。正如诗人所感受到的,在江西的永新、宁冈、萍乡、瑞金等地,络绎不绝的旅游团队和商业喧嚣,让他完全找不到什么感觉了!“莫非当年的感觉真的远去了?当年的感觉是什么?”诗人的真诚迫使他发出疑问。作为历史遗迹,当然有其物质的一面,也就是可供商业旅游操作的世俗层面,但若论精神元素,若论历史所蕴含的深意,则根本不可能寄望于拿着扩音喇叭、举着小旗的导游的喝声。如此,诗人的探访,或者说诗歌的介入方式才显得更为恰切适当。

比如这首《又见槐花》:

槐花开了/穷人的心也就舒开了/饥饿暂时离开灶台/树槐花/能点燃一年的希望

这是现实中的槐花,也是历史中的槐花:

那个年代/那个战火弥漫的年代啊/乡亲们用槐花充饥/战士们也用槐花充饥

诗人明白,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几乎没有哪里的穷人是没有吃过槐花的,而槐花那“细碎的柔软的花瓣”,也因为给瘦弱的肌体补充过生存的力量和营养而成为了“生命的旗帜”,所以,在某个地方,当他轻拉枝头将一串槐花贴近自己的脸颊时:



一股清苦扑面而来/像烈酒/伴着一阵长风/猛然掠过我

的心房

在诗人心目中,养育了革命和养育了人民的,是同一种东西,因而,革命的一切后果,包括成功的、胜利的喜悦中,永远都有一种清苦的味道。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只是对花瓣作为食物而伤怀,如果闻不到那一缕特别的清苦味道,如果不是诗人的敏感嗅觉,如果不是诗歌的含蓄、真挚、自然和朴素,那么在历史遗迹上的盘桓就可能绝然不同,一如按线路流程走过场丈量土地的参访者,嘴上唏嘘,眼睛茫然,心中麻木。

让我们回到“载道”的问题。在关于历史的种种表达中,除了浮光掠影的游历,除了恶意的玷污和中伤,在今天我们更需要找回的,是一种公心与良知,我们也许应该学会诚实地面对历史——无论遥远的历史还是就近的历史;同时,为了让我们不至于堕入无方向、无意义、无信仰的虚无之境,也有必要重新在群体的、共同体命运的框架内检视个体的存在,在与集体命运、集体记忆的互动关系中确认自我的成长及价值,也就是从作为共同记忆的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程步涛的《记住那些地方》就是一种“载道”的诗歌。在历史已经被学舌者们作为“谎言”和“垃圾”而抛弃,革命被用所谓的“纯知识”、“纯学术”解构之后,在历史进步的信念也遭耻笑的所谓扁平世界里,诗人继续称颂古老的乌托邦价值理想,呵护种族

随着当代军人知识结构的嬗变,从部队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就我所接触的层面,便有许多将军诗人和将军作家。我阅读过他们的作品,鲜明地感觉到他们大多有较开阔的思想视野、较丰富的人生阅历、较圆熟的文字技巧和较深刻的部队生活体验,他们创作的诗歌和散文,已经成为我国军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日,段天杰的散文集《永远的高度》出版,此书是他的近作荟萃,笔酣墨饱,正气凛然。其中许多篇章是追寻伟人踪迹、重现伟人风貌、重温峥嵘岁月、重振民族精神的佳作。段天杰选择了一些具体的景象、事象和物象进行叙述和描绘,以期达到见微知著的艺术效果。

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耸立着张思德石像,是当年举行张思德追悼会的地方。段天杰站在那里浮想联翩、情思潮涌。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已成为革命经典文献,镌刻在几代中国人心中。当年党风民风和赤交谊,领袖的话语暖人心肺。直到今天,“为人民服务”依然是警世之音,振聋发聩。段天杰立意高远,文思凝重,让每个读者在这句名言前沉思。

《最富浪漫色彩的会谈》笔致轻盈地描绘了毛泽东与斯特朗会见的情形,“没有富丽堂皇的殿堂,也没有鲜花、美酒和红地毯,就在门前摆放一张石桌,坐在石凳上”,而且没有森严的警戒,邻居的孩子可以随意跑过来观看“洋人”。然而这就是这次交谈,毛泽东发表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一理念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前途。段天杰旨在说明,千古英雄并非都是横空出世旗风鼓响,而有身居山野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大智慧,才堪称旷世奇才。

《借得鞋帽亦风流》更是妙趣横生,毛泽东从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是何等严峻的时刻,毛泽东却潇洒从容,“临时借了苏联医生阿洛夫的礼帽、皮鞋,在枣园大门口,周恩来左看右看,觉得帽子不合适,便将自己的军帽换给毛泽东。当毛泽东走下飞机的那一瞬间,山城人民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共最高首脑头上的帽子、脚下的皮鞋竟是借别人的”。此文还穿插了一个故事:“爱因斯坦穿一件旧大衣,在组别见到一位老朋友,朋友说他的大衣太旧了,劝他添置一件新的,爱因斯坦却说没关系,反正这儿谁也不认识我。后来,爱因斯坦成了闻名遐迩的物理学家,再见到那位老朋友时,还穿着原来那件旧大衣,于是朋友又劝他换件新的,爱因斯坦说,没必要,反正这儿谁都不认识我”。这个小故事既是对浅薄世俗文化的嘲讽,又把脱俗自信的精神境界写到极致,以此曲笔衬托毛泽东,让我们深刻理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才大略。还有“感情树”下话感情》、“读书石”前读思博》等篇幅,都从不同侧面凸显了毛泽东不平凡的学养、胸襟和风采,以充满热忱的叙述和笔酣墨饱的描绘,给人以巨大的诗化感染。

段天杰语言酣畅,又在优美的意境中,融入诗情画意:“凤凰山与宝塔山、清凉山隔河相望,山上景色秀美,草木葱茏。导游用延安普通话介绍: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只美丽的凤凰,落在这儿的一棵梧桐树上。直到老死之后,它将自己的身化成山脉,用来抵挡北国风寒。当时人们为了感念这只凤凰,就将这座山命名为凤凰山”。虽是平铺直叙却饱含深情。“八月的延安山青水绿,庄稼遍野,瓜果飘香。试想,在这样美好的季节里,黄土高原的太阳格外明亮,蓝天上一朵白云悠悠飘过,门前一棵古槐如一把撑开的大伞,树荫下领袖与作家在小石桌旁交谈,这是何等的惬意和浪漫”。以情入景,如诗如画。此外还有大量排比句式,不断深化情感,也不断强化语言气势,使散文中增添了政论的色彩。

多年军旅生涯,使作者对部队生活有深刻体验,对战士们充满挚爱的深情。在《永远的高度》这部散文集中,有许多短章生动传神地描绘了战士们鲜明的性格,坚定如山的意志,澄净如水的心灵与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那位“十班长”给人一种粗犷剽悍的印象,他立马奔驰迅如疾风,一肩扛起辕杆,让车尾着地,车轮悬空,而且,这个“粗人”还能辅导战友们学文化,从这些普通战士中竟产生了将军、学者和教授,真是“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而《我们不想家》《军号情结》等篇幅,都精当描绘出军人热爱部队的内心情感。《梨的滋味》深邃细腻地记叙了母慈子孝的动人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命脉,也闪耀着人性光芒。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散文的国度,我们既有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又有源远流长的散文传统,那些彪炳千秋的大诗人,往往也是大散文家,他们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超越了文学本身,形成了世代相因的中国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规范,并潜移默化地陶冶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当前散文创作有两个明显弊端,其一是平庸与泛泛,以相似的形式传递陈旧的认知;其二是细琐与矫揉,以小技巧把玩一己悲欢。我们期待散文家以其智慧与涵养,开拓崭新的散文天地。段天杰既有关悟又有灵性,既有较好的文化积淀,又有较好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倘若视角更新颖,内涵更丰盈,语言更空灵,他的散文定会更有艺术感染力。

记忆的整一性、连续性,在功利主义时代提示给世人一种无功利的价值和情感,这正是真正的清醒。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佐夫斯基讲座教授裴宜理,曾于2012年出版一部专著《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及其持久生命力的秘密。她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先生的一次对话中指出,中国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复杂,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者善于利用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源动员人民。他们“既懂得用精英文化,也懂得用民间文化资源”。裴宜理着重研究的安源革命传统为例,她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遗产就是李立三在当时所提出的罢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一点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强调了人的尊严”。而且她还认为,我们今天其实可以通过研究历史,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和革命遗产,“以便使用这个历史的资源来改善当代的情况”(见《南方周末》2011年6月16日F31)”。依此来看,马克思主义思想、近代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和最新的历史遗产,或者说存在着文化资源、艺术创造资源这样的向度。诗人虽非历史学家,其直觉力量、其情感取向和价值取向却能够启示于今天的人们,甚至警示于今天的执政者。即如他在《我们的旗帜,我们的誓言》一诗中所写到的:

大道一马平川/为什么总有人跌倒/号令就在耳边/为什么步履再也不那么整齐……/寄生在共产党人身上的私欲/和贪婪啊/如何才能把它们彻底清除/难道这/也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需要我们用多少时间和精力/才能破解求证……/我们在高速路上感受发展/感受路旁的迷人的风景/可是/凋敝的茅屋/和泥泞的乡路/依然会时时刺痛我们的神经

我所说的诗人的磊落和坦荡,就体现在这里。程步涛绝不是无关痛痒的吟颂者、无所事事的消遣者。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歌者角色的深层,仍内含一个共产党人的本真党性,这种党性使他对革命及其传统的敏感超出了一般浮泛的感伤之外,上升为责任和忧患,这种由政治觉悟转换而来的政治性抒情,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的入世精神,也是同历史上中国诗歌的伟大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从《诗经》中的各种风谣到两汉乐府,从曹氏父子到后来的杜甫、元稹等人,都是这一传统的创造者。反观今天,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诗人身上,这样的情怀和禀赋都不多见——或者他们迫于时风而不够理直气壮吧!